

論蘇聯的逃亡者

王台珍

壹、前言

本文的主題在研析蘇聯逃亡人員，亦即那些違反蘇聯法律，拂逆蘇聯政府心意而離開蘇聯之人士。他們大都是越過蘇聯邊界，跳出蘇聯船艦，或是逗留國外不願返回；但皆在其他非共黨國家尋求政治庇護。逃亡人員不同於其他成千上萬，「用腳來投票」反對蘇維埃政權之人。後者包括三股移民浪潮；(一)在革命和內戰期間，離開俄國的移民；(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發現自己置身蘇聯境外別無選擇地留在西方的離鄉背井人士(難民)；(三)目前大批離開的蘇聯公民，他們主要是猶太裔。

逃亡人員亦有別於少數被放逐人士，如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er Solzhenitsyn)，有別於在國外旅遊期間被剝奪蘇聯護照的人士，如大提琴演奏家姆斯提斯拉夫·洛斯托波維契(Mstislav Rostropovich)，或是因政治安排而離開蘇聯之人，如異議分子弗拉基米爾·布柯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他釋放後被帶到西方，以交換囚禁中的智利共黨頭目。雖然蘇聯共黨自掌權以來即為其人民逃亡問題所困擾，但本文探討範圍僅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九四五年)至今的逃亡人員。^①

文中之所以採用逃亡人員(者)一詞，而不用背叛者、變節者或投誠者，乃因認為這些字眼包涵相當強的價值判斷。逃亡者一語則較中性，且又稍帶有憐憫之心，象徵苛政猛於虎，以致官逼民逃，走為上策。該字俄文為 *Perebezhchiki*，其中 *Pere* 為常見的字首，可解為越過；而 *bezhchiki* 的字面意義為逃跑者。英文則為 *Defector*，此字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流行；是用來稱呼那些當時投靠西方的蘇聯軍人而創此新字。儘管它和 *Traitor* (賣國賊)不同，但也似乎暗指那些人多少是有點 *Defect* (缺點、瑕疵)。

註① *Vladislav Krasnov, Soviet Defectors: The KGB Wanted List*,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e Press, 1986), p.1.

蘇聯逃亡人員雖僅占蘇聯總人口的極小部分，在世界的芸芸衆生中更是微不足道；然而，他們的抉擇和際遇却發人深思。因此，對彼等之研究算得上是蘇聯研究中一個新的、小的却重要的範圍。本文基本參考材料之一是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於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蘇聯逃亡人員：國家安全委員會要的名單（*Soviet Defectors: The KGB Wanted List*）一書，作者弗拉基斯拉夫·柯拉斯諾夫博士（Vladislav Krasnov）爲前蘇聯公民，莫斯科大學畢業，並曾任職於莫斯科電臺，他於一九六二年投奔瑞典，現任教於美加州蒙特瑞國際研究學院（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俄國研究系。

貳、公開紀錄中的蘇聯逃亡人員

一、有關蘇聯逃亡人員的著作

事實上，這類的著作相當少。描寫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蘇聯逃亡人員的第一本且唯一的一本書是一九七七年出版於倫敦的不祥之人：早期蘇聯的逃亡者，作者是一名英國新聞記者。②他在書中介紹十一名逃亡人員（其中有五名已分別將自己的故事出書），但未敘述戰前逃亡行爲的歷史。書中雖附索引，却缺乏書目，註釋亦差，不適合學術研究使用；但作者充分了解和肯定逃亡行爲的意義。戰後逃亡人員所受到的重視較以往稍有增加。一九六七年英國一名上校情報員出版了逃亡者。該書由於組織結構鬆散，對學者以致一般人而言，皆不易閱讀，但他蒐集了許多逃亡人員的資料（並未提及來源）。作者視逃亡乃是一種「雙程交通」——東方往西方，西方往東方；對書中的主角，東西方的逃亡人員，不表同情；認爲他們是心智上不健全的人，在他們身上根本無所謂與生俱來的忠貞，他們無法成爲鷄尾酒會上的靈魂人物……。最後他承認，自己永遠不會喜歡一個逃亡者。③這種將西方逃亡人員相提並論的看法，顯然未能明瞭，逃亡係極權共黨政權下特有的現象。至於自西方往東方的逃亡者，往往是一些蘇聯國安會在西方招募到的潛伏間諜，在事機敗露後，逃往蘇聯。把「逃亡者」用在由西方進入東方的人身上，似乎有欠妥當；因爲無論什麼原因以致無法忍受「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方人士，只須買張前往蘇聯集團國家的單程票即可，沒有必要「逃亡」。

一九七四年出版的蘇聯秘密特工的秘密工作乙書，對蘇聯逃亡人員深表同情，該書雖出自一名老練的新聞記者之手，却是既

註② Gordon Brook-Shepherd, *The Storm Petrels: The Flight of the First Soviet Defectors*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註③ Vernon Hinchley, *The Defectors* (London, Toronto, Wellington, Sydney: George C. Harrap, 1967), pp. 249-50.

通俗又合於學術著作標準。它並不是寫逃亡者本身，而是透過許多逃亡者所提供的資料來揭露蘇聯國安會的秘密工作。他並且提出了一項課題：西方必須要打破對國安會壓迫和妄為表示恭順的沉默。^④至於學界對逃亡者的研究多數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前，最著名的是哈佛「蘇聯社會體系研究計畫」，該計畫創立於一九五〇年，由美國空軍所支持。它是以詳盡的問卷調查方式來統計前蘇聯公民對蘇聯政治、文化、社會、種族、和經濟生活方面所持的主導態度。雖然三千名受訪者中大多數是離鄉背井的難民，即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是被納粹強迫送往他國，或是自願離開蘇聯之人，但作者並不諱言其中有數目不詳的逃亡人員。美國學者根據此計畫所蒐集到的資料，寫了許多書。例如，蘇聯公民：一個極權社會下的日常生活一書中指出：在蘇聯境內總有一些人是站在我們這邊，但他們是少數，或許該說是小部分。因此，我們最好轉向，尋求其他基地；不要再寄望蘇聯放棄統治世界的長程目標……。如果西方失敗，便會讓蘇聯在下半個世紀裏決定人類的的生活方式。^⑤

二、蘇聯逃亡人員的著述

由逃亡人員本身所寫的書籍甚多，茲以描寫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九年期間為重點。在以下提出的十三本書中，前六本書以史達林時代為焦點，其次五本書則著重史達林和赫魯雪夫時代，最後兩本則敘述布里茲涅夫時代。這十三本書是：維克多·克拉夫琴柯 (Viktor Kravchenko) 的我選擇了自由，^⑥伊果爾·古仁柯 (Igor Gouzenko) 的鐵幕，^⑦歐克莎娜·柯聖吉娜 (Oksana Kasenkina) 的奔向自由，^⑧彼得·皮羅哥夫 (Peter Pirogov) 的我為什麼逃？^⑨格瑞果瑞·克里莫夫 (Gregory Klimov) 的恐怖機器，^⑩格利果瑞·托卡耶夫 (Grigory Tokaev) 的史達林代表戰爭，^⑪彼得·得瑞賓 (Peter Deriabin) 的秘密世界

- 註④ John Barron, *KGB: The Secret Work of Soviet Secret Agents* (Toronto, New York, London: Bantam, 1974), p. 45.
- 註⑤ Alex Inkeles and Raymond A. Bauer,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397-98.
- 註⑥ Victor K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Life of a Soviet Officer* (New York: Scribner's & Sons, 1946).
- 註⑦ Igor Gouzenko, *The Iron Curtain* (New York: Dutton, 1948).
- 註⑧ Oksana Kasenkina, *Leap to Freedom* (New York,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49).
- 註⑨ Peter Pirogov, *Why I Escaped: The Story of Peter Pirogov* (New York: Duell, Sloan, & Pearce, 1950).
- 註⑩ Gregory Klimov, *The Terror Machine: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oviet Administration in Germany* (New York: Praeger, 1953).
- 註⑪ Grigory Tokaev, *Stalin Means Wa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51).

；②尼古拉·霍賀洛夫 (Nikolai Khokhlov) 的奉良知之名，③弗拉基米爾和艾夫多吉爾·彼得洛夫 (Vladimir & Evdokia Petrov) 的恐怖帝國，④亞歷山大·卡茲那契夫 (Aleksander Kaznacheev) 的蘇聯大使館內幕，⑤尤里·柯洛特古夫 (Yury Krotkov) 的我來自莫斯科，⑥列歐尼德·弗拉基米洛夫 (Leonid Vladimirov) 的俄國人的太空恫嚇，⑦亞列克希·米爾葛古夫 (Aleksey Myagkov) 的國安會內幕。⑧

從這些書透露的訊息包括：(一)蘇聯政權賴欺騙、威嚇和暴力來統治，由於合法的反對不被容忍，因而訴諸逃亡。促成逃亡的決定性因素，因人而異，但不外乎是害怕迫害，想說實話，希冀更好的生活，追求自由，想要抗議和反擊一個要消除他們人格的制度。(二)對他們每一個人來說，逃亡並不是容易做成的決定，除了要冒很大的危險外，還要有適當的機會；他們深知萬一失敗則境況悲慘，要是成功則無法再見到他們所愛之人，而且報復的陰影亦將終生相隨。但他們之中無人覺得是在叛國，反之，他們認為自己的行為既肯定了人性尊嚴，也對俄國盡了愛國之責。(三)發現西方一些輿論領袖對蘇聯的虛偽宣傳深信不疑，西方也往往並未把他們當作是宣傳戰中的活武器來歡迎，有時甚至不願意給予庇護。

所謂「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這些作者講述許多局外人所不知之事。他們描述史達林統治下的生活，通常受到西方懷疑和排斥。但這些敘述在以後被其他資料所證實，最著名的是赫魯雪夫於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屆黨代表大會上批判史達林的秘密演說。所以，沒有理由認為逃亡人員對赫魯雪夫和布里茲涅夫時代所提供的消息會不真實；他們可能在判斷和細節上有錯，但不至於蓄意捏造。

一九六九年以後，蘇聯逃亡者所撰的自傳體書籍包括：迫害者，⑨米格機飛行員：別連柯中尉的最終逃亡，⑩今天的國安會

註⑨ Peter Deriabin and Frank Gibney, *The Secret World*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1959).

註⑩ Nikolai Khokhlov, *In the Name of Conscience* (New York: David McKay, 1959).

註⑪ Vladimir Petrov and Evdokia Petrov, *Empire of Fear* (New York: Praeger, 1956).

註⑫ Aleksandr Kaznacheev, *Inside a Soviet Embassy: Experience of a Russian Diplomat in Burma* (Philadelphia, New York: Lippincott, 1962).

註⑬ Yuri Krotkov, *I Am from Moscow: A View of the Russian Miracle* (New York: Dutton, 1967).

註⑭ Leonid Vladimirov, *The Russian Space Bluff: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oviet Drive to the Moon* (New York: Dial Press, 1973).

註⑮ Aleksei Myagkov, *Inside the KGB: An Expose by an Officer of the Third Directorate* (England: Foreign Affairs Publishing Co., 1976).

註⑯ Sergei Kourdakov, *The Persecutor* (Old Tappan, N.J.: Fleming H. Revell, 1973).

註⑰ John Barron, *MIG Pilot: The Final Escape of Lt. Belenko* (New York: Reader's Digest Press; distributed by McGraw Hill, 1980).

：隱藏之手，②嚴重叛國，③陷阱，④沙德林：一去不返的間諜，⑤蘇聯軍隊內幕，⑥和高幹人名錄：蘇聯的統治階級。⑦

三、蘇聯逃亡人員之剖白

柯拉斯諾夫在研究蘇聯逃亡人員時，曾寫信給美國中央情報局、移民局和國務院索取資料。結果，僅國務院提供一份其官員在一九五一至一九六〇年訪問二十二名逃亡人員的紀錄。紀錄是由國務院印行，標題是「前蘇聯公民所報告的蘇聯」。這本紀錄發行數不多，其目的僅僅是給研究蘇聯事務的學者提供一些不易取得的基本資料。該項訪問在一九六〇年中斷後未再恢復；那時蘇聯開始大肆宣揚和平共存。新共和國雜誌上一篇名為「不受歡迎的逃亡人員：對雙方都是尷尬」的文章說明美國的立場。作者自稱是華盛頓圈內人；他說：冷戰時代已經過去了，一名逃亡人員在西方已不再受到歡迎，不再用來當做宣傳戰中的活武器，證明蘇聯的暴虐和西方的自由。相反地，在和解時期，逃亡者被視為一種尷尬，一種負擔，會對美蘇磋商產生不利影響。他還洩露一項應令聲稱對人權關切的卡特政府感到羞愧的秘密，那就是，美國官員不再記錄逃亡人員的談話，避免引起大家注意。⑧

在前述十年間的談話紀錄中，主要內容有：個人資料；逃亡的動機和經過情況；工作經驗；有關蘇聯制度中各機構的情報，如軍隊、秘密警察、和黨；蘇聯國內情況，如社會福利、文化和教育、宗教和文化、民族差異和問題；蘇聯和美國所持的態度；政治上的希望和對蘇聯將來的預測。

有人或許會說這些接受詢問的人，爲了要取得在美國永久居留權，說的話有投人所好之可能。這點在他們答覆有關對美國看法時，也許有幾分正確性，但在其他方面則未必，他們可能誇大蘇聯境內普遍不滿的程度，但這係出自他們的強烈感受，而不是企圖誤導美國人民。有關希望蘇聯將來如何演變，意見則相當分歧：有的說蘇聯人民還是會談革命前的生活……，但並不希望回到沙皇時代。有的說大多數俄國人除了希望見到警察的控制能結束外，不知道在政治該要求什麼……；但他們有信心，相信俄國

註⑧ John Barron, *KGB Today: The Hidden Hand* (New York: Reader's Digest Press;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83).

註⑨ Vladimir Sakharov and Umberto Tosi, *High Treason* (New York: Putnam's Sons, 1980).

註⑩ Anatoly Fedoseev, *Zapadnia: Chelovek i sotsializm (The Trap: Man and Socialism)*. 2nd ed. Frankfurt/Main: Possev, 1979).

註⑪ Henry Hurt, *Shadrin: The Spy Who Never Came Back* (New York: Reader's Digest Press, McGraw-Hill, 1981).

註⑫ Viktor Suvorov, *Inside the Soviet Army* (Norton, 1983).

註⑬ Michael Voslensky, *Nomenklatura: The Soviet Ruling Class*. Trans. Eric Mosbacher; preface by Milovan Djilas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1984).

註⑭ Charles Fenyesi, "The Unwelcome Defector: An Embarrassment to Both Sides," *New Republic*, 178 (April, 22 1978): 9.

終究會建立一種民主的生活，即可以自由和外國交換觀念，科學家和學者享有知識上的自由，擁有企業自由和民主的公民權。有的則認為理想的政府是美國式的政府。

叁、國安會要的名單（一九四五—一九六九）

一、概述

前面我們對逃亡現象做了主觀的探討，引述逃亡者本身的證言。現在，將進行客觀的分析。這項研究是以一份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通緝名單為依據。這份名單的全名為「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外國特務，祖國叛徒，反蘇聯組織，通敵者，和其他罪犯的名單」，它大約由國安會每三至六年印行成冊，每冊約含二千至六千份個人資料，印行期間每隔兩個月左右便發行所謂最新報告，這些報告將併入下一冊出版，每冊的印行數量在一千五百至一千六百本之間，屬極機密，僅在蘇聯境內和境外的國安會機構流傳。^②

很顯然，其中一冊從國安會辦公室私運出來，並落入「自由俄聯」（NTS）之手。自一九七七年一月起至一九七八年六月止，「自由俄聯」在其月刊播種（Possev）上陸續刊登六百名居住在蘇聯境外逃亡人員的姓名，這些人名是從國安會通緝名單上摘錄下來的。^③播種月刊聲明，願意提供黑名单上的他或她一份個人資料；唯一條件是當事人必須附上經過公證的書面申請。柯拉斯諾夫在赫然發現自己榜上有名後，寫信要求「自由俄聯」寄給他一份他本人的資料；在看過這份資料後，對於其真實性和豐富細節至感滿意。他於是興起以國安會名單做為研究戰後逃亡行爲的統計基礎之念頭。一九七九年夏天，他聯絡了「自由俄聯」的職員，請求他們贈給一份名單給胡佛研究所檔案保存處，俾供學術上使用。對方邀請柯氏前往德國法蘭克福「自由俄聯」總部看名單。抵達後，「自由俄聯」提出二個條件，第一，為保護隱私，所有逃亡人員和其親戚的名字必須刪除。第二，去掉每頁頁數，並將個人資料之順序重新任意組合。柯氏自六百個名單中取出四百七十個個案，排除了可能是在二次大戰戰時逃亡之人。所以，他的複製本是以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為起點，又以國安會名單上所記錄最晚個案的日期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為終點，並用電腦加以詳盡統計分析。這份複製本目前已存放在胡佛研究所的檔案處。其實，國安會的名單並未涵蓋在上述期間內所有的逃亡

^② "O Yozysknykh Spiskakh KGB" (About the KGB's Wanted Lists), Possev, no. 12, December 1976, pp. 29-31.

^③ See Possev, nos. 1, 2, 4-11, 1977, and nos. 1, 2, 4-6, 1978.

人士，它不包括：(一)逃亡失敗者；(二)逃亡成功，但被西方政府強制遣返之人；(三)在國安會名單編纂時已死亡之人；(四)那些自願返回或由國安會海外特務押回之人；(五)未被國安會偵察到的逃亡人員。然而，摘錄出的四百七十人已足夠做爲統計基礎。在分析資料前，讓我們先看看若干國安會名單中所記載的個案內容。

二、案例

個案一：

霍賀洛夫·尼古拉·葉夫蓋涅維契 (Khokhlov Nikolai Evgenovich)，一九二二年出生於高爾基 (Gorkii) 市，俄羅斯人，完成高中教育，前國安會成員。母親米哈羅夫斯卡雅·安娜·維克多洛夫娜 (Mikhailovskaia Anna Viktorovna)，姐姐或(妹妹) 霍賀洛娃·歐爾珈·葉夫蓋妮夫娜 (Khokhlova Olga Evgenievna) 及同父異母姐姐(或妹妹) 斯維特蘭娜·葉夫蓋妮夫娜 (Svetlana Evgenievna) 居住在莫斯科市。妻子提瑪許凱維琪·依蓮娜·阿達摩夫娜 (Timashkevich Elena Adamovna) 和兒子住在伊凡諾伏 (Ivanovo) 市。

一九五四年，他被派到西德出特勤時，背叛了祖國。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在缺席判決中，將他判處極刑。照片和筆跡樣品附於檔案。

卷宗存放於蘇聯部長會議所屬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二總局。

此個案中的當事人即奉良心之名一書的作者(參閱第壹節)。由於他的個案已在播種月刊上以俄文刊載過，故人名未予刪除，正楷字部分在原始資料中，有特別強調的意思。其中內容和霍氏叛逃成功後，在波昂召開記者會所說雷同。但在國安會名單中，除刊載的內容有趣外，被省略的更有趣，霍氏那次特勤任務是奉令暗殺當時「自由俄聯」的領袖喬治·歐克羅維契 (Georgy Okolovich)；結果，他不但未動手，反而面告歐氏自己不想再在國安會服務了，隨後爲證明自己的可靠，他提供情報給德國當局，逮捕了他的二名同夥。另因蘇聯不太風行採指紋，故以筆跡樣品存檔。

個案二：

××，亦即××(隱匿姓名)，一九二二年生於契爾卡塞 (Cherkassy) 省的契爾卡塞市，猶太人，前共青團團員，完成高中教育。高個子，斜肩，長頸，淡棕色頭髮，灰色眼睛，橢圓形臉，大鼻子。父親××，母親××住在契爾卡塞市。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前線作戰時遭德軍生擒，囚禁在德國境內的戰俘營中。被蘇聯軍隊從戰俘營釋放後，自一九四五年四月起在「除奸部」(SINERSH·蘇聯負責監督武裝部隊的秘密警察) 兼任口譯員。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逃入德國美軍佔領區，一九四九年化名××住

在西德，一九六一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繼續和親友保持連繫。一九六一年在缺席判決中，被四八二四〇號軍事單位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一九六六年後的照片和筆跡樣品附於檔案。

這類個案佔戰後逃亡人員的比例最多，主角是蘇聯戰後駐紮在德、奧軍隊的軍人。資料中提及一九六六年的照片，顯示他是國安會追蹤達二十一年的目標，且在逃亡十六年之後才被處以死刑。

個案三：

××，一九三一年出生於塔林，愛沙尼亞人，前共青團團員，六年級的教育程度，住在塔林。在波羅的海國營輪船公司的波迪卡 (Baltika) 渦輪發電船上擔任技工。中等身材，金髮，耳朵大而突出。母親××，兄弟××，和姐(或妹)住在塔林。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日，隨波迪卡船訪問紐約港時逃脫，並向美國當局要求政治庇護。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缺席判決中，由列寧格勒市法院刑事庭判決，在勞動改造營中服役十五年。目前在美國居住，受雇於電子公司。一九六六年以後的照片和筆跡樣品附於檔案。

他的逃亡發生於赫魯雪夫時代，到了布里茲涅夫時代無甚改變，僅以一張新照片來提高檔案的時效性。照片可能是國安會特務在美國秘密拍攝，或由他和親戚的通信中偷取出來，且因他是平民，故由普通法院判決。

個案四：

××，一九四三年生於莫斯科，俄羅斯人，前莫斯科國立大學東方語文學院學生，未完成大學教育。身高一七二公分，體格壯碩，步伐沉重不平均，淡棕色頭髮，大大的灰眼睛，戴眼鏡，眼鏡摘掉時會頻頻眨眼，鼻子大而多肉，手臂強壯有力，說話時慣做手勢。妻子××，父親××，母親××和兄弟××住在莫斯科。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三十一)日晚在喀布爾擔任阿富汗礦工部顧問人員的翻譯時失蹤。他後來在美國出現，並被蘇聯駐紐約使館人員從一張照片上認出，照片和筆跡樣品附於檔案。

這個個案代表著蘇聯派駐第三世界國家人員的逃亡。他們通常具備外語能力，對國外生活的了解亦較多。此外，當事人並未被缺席判決，反應出後來蘇聯政策已有轉變。

三、統計結果

將上述四百七十個案在電腦的運算下加以量化的結果，可以解答有關逃亡現象和規模的問題。例如：每年有多少人逃亡？大多數逃往那一個國家？蘇聯所說的大多數逃亡者具有犯罪背景是否正確？茲先列舉一些統計表再做補充性的說明。

表一：逃亡人員的種族背景

種 族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阿美尼亞	13	2.8
亞塞拜然	2	0.4
白俄	15	3.2
愛沙尼亞	30	6.4
喬治亞	1	0.2
猶太	36	7.7
拉脫維亞	21	4.5
立陶宛	14	3.0
莫爾達維亞	2	0.4
俄羅斯	181	38.5
韃靼	3	0.6
烏克蘭	82	17.4
其他	26	5.5
無法得知	44	9.4
總 計	470	100.0

在四百七十名逃亡人員中，只有十五位女性，而逃亡者的年齡從十八歲到六十歲都有，平均年齡則是二八點五歲強。以種族來分，約三分之二是東斯拉夫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人）。但因少數民族如猶太人、愛沙尼亞人……，其總人數不多，故相對的他們逃亡的比例較高。百分之五三點三教育程度低落（不超過七年級），顯示許多逃亡人員是蘇聯佔領德國的服役人員，而全部逃亡人員加入共黨和共青團的比例極高。僅有三十四名逃亡人員具備外語能力，且通常是德語。約有五分之一拋妻別子，而大多數是離開父母和兄弟姐妹。

陷於谷底，這種波動很明顯是受到蘇聯國內和國際政治的影響（如領導者的更替和柏林圍牆的興建）。最受歡迎的逃往國是西德和奧地利，而鄰國瑞典和土耳其也接納相當多的逃亡者，因他們在政策上比芬蘭表現更為友善。至於前往我國的逃亡行為是發生於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蘇聯油運船圖阿普斯（Tuapse）在載運飛機燃料

表二：每年的逃亡人數

逃 亡 年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1945	15	3.2
1946	28	6.0
1947	59	12.6
1948	60	12.8
1949	42	8.9
1950	19	4.0
1951	22	4.7
1952	11	2.3
1953	13	2.8
1954	21	4.5
1955	8	1.7
1956	11	2.3
1957	18	3.8
1958	5	1.1
1959	9	1.9
1960	8	1.7
1961	14	3.0
1962	10	2.1
1963	9	1.9
1964	10	2.1
1965	18	3.8
1966	19	4.0
1967	20	4.3
1968	17	3.6
1969	2	0.4
無法得知	2	0.4
總 數	470	100.0

在載運飛機燃料前往中國大陸時，被我國軍截獲帶返的。四十九名船員中有二十名選擇留下，後來，二十名中有九名獲准前往美國。然而，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他們之中的五名經蘇聯外交人員遊說後，從美國

返回蘇聯。美國參議院調查結果認為，他們是被迫回國，美國屈從蘇聯的壓力而做了不必要的讓步。

③

註③ See U. 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The Episode of the Russian Seamen*, May 24, 1956.

表三：逃亡投奔的國家

國家	逃亡人數	百分比
西德(包括西柏林)	201	43.0
奧地利	59	12.6
瑞典	33	7.0
土耳其	29	6.3
加拿大	17	3.7
英國(包括其屬國)	16	3.4
芬蘭	14	3.0
丹麥	10	2.1
伊泰	10	2.1
臺灣(中華民國)	10	2.1
日本	8	1.7
挪威	6	1.3
法國	5	1.1
瑞典	4	0.8
希臘	3	0.6
西班牙	3	0.6
美國	3	0.6
阿富汗	2	0.4
埃及	2	0.4
荷蘭	2	0.4
印度	2	0.4
比利時	1	0.2
緬甸	1	0.2
泰國	1	0.2
喀達	1	0.2
達荷內	1	0.2
亞克	1	0.2
巴比	1	0.2
黎律	1	0.2
菲賓	1	0.2
南韓	1	0.2
多哥	1	0.2
烏拉	1	0.2
圭法	1	0.2
無得知	14	3.0
國家總數：33	總人數470	100.0

之活捉。自史達林死後，對於逃亡人員尚留在蘇聯的家屬採直接報復的措施業已終止，但他們有時仍會感到不便和受到騷擾。

以統治者來劃分，史達林時代的典型逃亡者，是一些被徵召入伍之人，他們生長於集體農場，後逃往德國的西方佔領區，目前在居住國從事各式各樣的謀生工作，他們戰時曾為祖國賣命。他們沒有犯罪，但仍被軍事法庭缺席判處死刑。赫魯雪夫時代的典型逃亡者，包括商船的水手在訪問港口時跳船，或是工廠技工越過邊界，或是在柏林圍牆興建前有幸逃往西柏林的年輕士兵。教育程度高些，也沒有背負死刑。他們聽到了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譴責，但警告別人勿輕信赫魯雪夫的承諾或加入海外俄國人的組織。布里茲涅夫時代的典型逃亡者，包括在文化交流中派往西方的學者，或是獲得前往國外觀光的傑出知識份子，但却踏上了不歸路。他們目睹美國在越南的潰敗，以及蘇聯粉粹捷克的改革運動。他們留在西方不是因為對它有何幻想，而是因為他們更不願回到蘇聯受苦。像以往的逃亡者一樣，他們也是寂寞的，但他們比以前的人更有希望，因為他們聽到了來自蘇聯境內異議份子的聲音。

表四：居住國

居住國	人數	百分比
阿根廷	11	2.3
澳洲	19	4.0
奧地利	10	2.1
巴西	5	1.1
加拿大	42	8.9
智利	9	1.9
丹麥	2	0.4
英國	25	5.3
法國	8	1.7
以色列	8	1.7
義大利	2	0.4
挪威	1	0.2
瑞典	28	6.0
土耳其	2	0.4
美國	107	22.8
西德	88	18.7
其他	9	1.9
無法得知	94	20.0
總數	470	100.0

在犯罪背景方面，四百一十九名逃亡人員在逃亡前即使以蘇聯的標準來衡量都是絲毫沒有污點，僅五十一名被提及曾在德國做過戰俘和奴工。有六十六起在逃亡時發生的罪行，皆是為了自衛而造成的。在缺席判決方面，有時次重要的逃亡者被判了死刑，而一些被控洩密給外國人者反而倖免，顯然蘇聯當局還希望將

在等待出境簽證。他們之中除大多數是猶太人外，也夾雜著數萬日耳曼人和阿美尼亞人，僅極少數的俄羅斯人和其他民族能從中

表八：史達林、赫魯雪夫和布里茲涅夫時代的逃亡

項 目	人數	百分比
史達林 (1945~1953)	263	56.0
赫魯雪夫 (1953~1964)	130	27.7
布里茲涅夫 (1964~1969)	77	16.4
總 數	470	100.0

五人。②而一九六九年以後的逃亡是和下列兩種情況互相呼應：

一九六九年以後，無法取得國安會所記載的逃亡人員名單，因此只得從報章雜誌的報導來探討其規模和意義。結果發現布里茲涅夫掌權初期有許多具有聲望之人逃亡的趨勢繼續存在，有些甚至是蘇聯人民耳熟能詳的人物。從一九六九迄一九八五年有案可考的學者和知識分子計四十六人，音樂界和歌唱界人士二十七人，舞蹈家十三人，海員和漁夫三十一人，運動家十三人，軍事人員十三人，外交人員、安全人員和其他官員三十

一、概述

肆、一九六九年以後的逃亡者

表五：逃亡人員在逃亡時所犯下的罪行

罪 名	發生次數	百分比
偷竊錢財	12	2.6
攜帶武器（手槍，來福槍和手榴彈）	11	2.3
盜取和洩露秘密	32	6.8
施暴或傷人	6	1.3
殺人	5	1.1
總 數	66a	14.1

a 有時一名叛逃者被控數罪，故總數應少於66。

表六：法院判刑

判刑刑期	人 數	百 分 比
7年	1	0.2
10年	8	1.7
12年	1	0.2
15年	15	3.2
25年	35	7.4
死刑	224	47.7
無法得知	186	39.6
總 數	470	100.0

表七：柏林圍牆建成（一九六一
年）前後之逃亡

項 目	人數	百分比
不詳	16	3.4
柏林圍牆建成之前	349	74.3
柏林圍牆建成之後	105	22.3
總 數	470	100.0

獲益。但是，蘇聯政府在採行此種政策之際，似乎同時也在培植人民一種觀念，即：處心積慮想要離開蘇維埃各民族兄弟情誼之人，是那些「叛國的」猶太人，「頑固的」日爾曼人，和「不愛國」的阿米尼亞人。安德烈·沙卡洛夫 (Andrei Sakharov) 便曾提出這類警告。^②

雖然，國際間的壓力是促使蘇聯政府讓步的原因之一，但蘇聯國內的自救行為所產生的效力亦不容忽視。較著名的事件發生於一九七〇年六月五日，一羣蘇聯公民，大多數為猶太人，在一位退休空軍少校和一名年輕異議份子愛德華·庫茲涅察夫 (Edward Kuznetsov) 的領導下，企圖登上一架停留在列寧格勒斯摩尼 (Smolny) 機場中 AN-2 型國內線航空機，但彼等尚未登機即被逮捕。在聖誕節前夕，他們全部被判以重刑，兩名領導人則被判死刑。好在另一名異議份子，庫茲涅察夫之友，將判決輾轉送交西方新聞界，因而在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新年前夕，蘇聯政府終於將死刑改判十五年勞役。然他們藉逃亡來抗議猶太人所受不平等待遇，當然有助於打開猶太人移民之門。^③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後來猶太人享有移民機會，但挺而走險的逃亡事件仍然層出不窮。因為，萬一申請移民未獲通過，他們的際遇會更加悲慘，愈發被人視為社會殘渣。

(二) 蘇聯國內異議和人權運動興起：蘇聯為控制國內異議和人權運動，有時將一些著名人物放逐，如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於一九七四年離開蘇聯，一九七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沙卡洛夫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後被放逐到高爾基。這種方式或許導致一些人的想設法自我放逐——成為逃亡者，儘管前者所獲得的評價往往較後者為高。

二、逃亡與和解

一九七〇年代是由「羞恥之日」來揭開序幕。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西瑪斯·庫德卡 (Simas Kudirka)，蘇聯拖網船蘇維埃立陶宛號 (Sovetskaja Litva) 上一名立陶宛籍的無線電操作員，跳上了美國海防巡邏艇「警備號」(the Vigilant)。當時兩艘船是在美國領海之內，亦即麻州漫沙文雅島 (Martha's Vineyard) 附近進行美蘇捕魚權的談判，因而停泊在一起。後來發生的事都記載在羞恥之日和那些還在海上的人兩本書中。^④ 根據美方一位海防司令的命令，「警備號」船長允許蘇方

註② Andrei D. Sakharov, *My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5), p. 58.

註③ Joshua Rubenstein, *Soviet Dissidents: Their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Boston, Mass.: Beacon Press, 1980), pp. 169-74.

註④ Algis Rukšenas, *Day of Shame: The Truth About the Murderous Happenings Aboard the Cutter Vigilant During the Russian-American Confrontation of Martha's Vineyard*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3); and Simaskudirka and Larry Eichel, *For Those Still at Sea* (New York: Dial, 1978).

派遣一隊人馬上船，找出無助的逃亡者，在狠狠毆打使其就範後，用繩索捆綁，並乘坐美方所預備好的救生艇，押解回船。後來，庫德卡被控叛國罪，在西伯利亞勞工營中服役。然而，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四年後他從勞工營中釋放出來，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五日和家人一同飛往美國。這一事件充滿嘲諷意味，因為庫德卡在當時企圖逃亡時並不知道，由於他的母親出生於布魯克林（Brooklyn），他也因而擁有美國公民權。

拒絕給予庫德卡政治庇護和把他遣返，此違反了美國的既定政策，而引起輿論譁然。尼克森總統下令國務院頒佈新的相關規定。一九七二年新規則公佈，其中授權美方得在對方強制遣返時使用武力，且在美國領域內發生的尋求政治庇護，應立即向國務院和白宮報告。發生在美國境外的尋求庇護亦應報告；即使美國單位和設施處於外國的領域管轄下時不使給予庇護。然而，美國海外單位給予庇護所受的限制，並不適用於那些能提供情報的逃亡者，彼等的尋求庇護將按個別法規處理。此外，在極端和特別的情況下，可基於人道理由給予暫時的庇護。^⑤儘管有了新的方針，史密斯·辛普森（Smith Simpson）美國一位退休外交官認為，即便到一九七九年底國務院處理類似案件的情況並未改善，在訓練外交官時，許多重要問題，如逃亡者尋求庇護事宜甚至被省略掉。若干實例也顯示美國在處理逃亡事件上不恰當和不機警。^⑥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維克多·別連柯（Viktor Belenko）中尉駕駛米格二十五飛機飛往日本數星期後，蘇聯空軍中尉薩昔莫夫（Valentin Ivanovich Zsimov）亦駕駛安東諾夫二型（Antonov-2）飛機飛抵伊朗。雖然伊朗官方表明薩昔莫夫曾立即要求美國給予政治庇護，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的發言人却說沒有接獲正式的庇護要求。結果，在已去世的伊朗沙皇命令下，十一月將薩氏遣返蘇聯，他被判處十二年的勞役。美國政府雖未直接涉及此事件，但仍未盡到給予當時是美國的一個堅強盟邦的伊朗一些壓力將人留下。人們不禁要想，薩昔莫夫的逃亡以悲劇收場，大概是因為他開的是老舊單引擎噴撤農藥的飛機，可能不會有什麼令美國感興趣的情報。

七十年代以庫德卡事件為始，十年後又以一件不大光彩的事件為終。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蘇聯入侵阿富汗軍隊的一名士兵克魯格洛夫（Kruglov），向美國駐喀布爾大使館尋求庇護，他必定十分驚訝，大使館內竟然無人能說俄語。蘇聯得知克魯格洛夫逃亡後，立即要求將其引渡，並命阿富汗的安全部隊包圍使館，使館上空則派蘇聯直升機環飛。華盛頓官方保持數日沉默，設法找尋一名翻譯搞清楚怎麼回事。直到九月十九日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內的一名說俄語的外交官抵達喀布爾交涉。九月二十一

註⑤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13, 1972.

註⑥ Smith Simpson, "One Day in the Life of Simas Kudirka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September 1979, pp. 17-34.

日，克魯格洛夫在會見蘇聯駐喀布爾大使後表明自願返回蘇聯。國務院指示發佈有關會面的詳細報告以證明「格氏可以選擇留在使館，以待前往美國或第三國」。儘管如此，仍舊不能掩飾克氏的選擇會使美國人鬆一口氣，這位年輕的士兵，不需要譯員，也能從使館工作人員的表情中看出，他們多麼擔憂他自私的行徑和堅持會使被包圍的使館情況惡化，說不定還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此外，他發現美國總統所稱世界上最重要地區的使館，居然找不到一個能說俄語的人，他放棄了一切希望。美國國務院引用蘇聯大使的話說：「克魯格洛夫能立刻退役，回去繼續他的科技教育，他前往美國使館的行爲不會受到指控和責罰。」但這名士兵離去後音訊全無，國務院是否做過任何努力讓蘇聯大使能實踐諾言呢？

美國在庇護逃亡人員方面也有令人激賞的表現。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七名來自西伯利亞猶太五旬節教派的蘇聯公民，越過蘇聯警衛界湧進美國駐蘇聯大使館，希望美國協助他們移民。他們在使館裏一待就是五年。蘇聯對此案相當堅持，唯恐先例一開，以後天主教徒，東正教徒，回教徒和佛教徒都會效法。一九八三年四月，蘇聯終於屈服於世界輿論壓力，允許這羣人移民出境。這是人權史上的重大勝利。然而，美國並非在處理所有國內外所發生的逃亡事件都這麼用心；^②但人們深信只要自由世界的政府堅定地提醒蘇聯應遵守赫爾辛基協定（一九七五年）和其他國際性的人權條款，結果會更好。

伍、逃亡人員的返回

從一九四五年迄今，逃亡成功後又返回蘇聯的人數約有五十人。^③排除那些被逃往國強制遣返，或可能是刻意安排的間諜外，仍有一些自動返回者。（除非蘇聯國安會故意讓名單流傳，否則應不會將自己安插的間諜納入黑名單之內。一九六九年以後的逃亡人士中是否夾雜該種危險人物則無法得知，但應不排除此種可能。然那種爾虞我詐偵探小說式的情節不在本文探討真正逃亡人員之列）。歸納他們返回的原因計有三類：

一、情緒化：阿莉魯耶娃·史維蘭娜（Alliuyeva Svetlana），一九二六年生，史達林之女，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投奔印度，後轉往美國，當時曾燒毀護照，誓言永不返回蘇聯。她在美國和英國居住十七年後，帶著和第二任丈夫（美籍建築師）所生的十五歲女兒，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自英國返回蘇聯。回國時曾猛烈批評西方，而蘇聯宣傳媒介亦渲染她的講話。一九八六年四月，在她寫信給戈巴契夫後的四個月，獲准離境，又回到美國，並表示返國純爲探親，蘇聯生活難挨。^④從阿氏的行爲來看，她

註② 同註①，pp. 144-157.

註③ 同註①，pp. 207-210.

註④ 明報，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四月七日、四月十七日。星島日報，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五月十九日。

似乎已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麼？但對這位昔日的「公主」，今日的老嫗，也無須多所苛責。

二、適應不良：無法克服面對新生活的困難時期，做慣了依附的藤蔓，不能成爲挺拔的大樹。這種心境即使是獲得移民至以色列的猶太裔異議份子也可能發生。他們驚訝政府不會爲他們找工作，或給予他們免費醫療……^④ 據「美聯社」消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五十位蘇聯來美新移民，重新返回蘇聯。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在美生活六至八年，有些已是美國公民，但終與美國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加上思鄉心切，所以打道回府。他們之中有的將適應良好的子女留在美國，有的則携子女同歸，害怕子女在美會墮落、犯罪。^⑤ 但是他們會發現俄羅斯祖國已不如以前那樣熱心去供養他們。戈巴契夫擬訂的目標明確要求更大的進取心，也要求更實力和更高品質的工作。^⑥

三、蘇聯的拉攏：戈巴契夫不斷努力爭取知識分子的支持，包括放寬規定，讓流亡在外的人士，在異國失望之後回返祖國；許多蘇聯流亡分子認爲在外國未能充分發揮他們的進取心，爲生活拋棄了自己原有專業。蘇聯官員說，已有一千名蘇聯移民提出申請，要求重返蘇聯，其中包括一九八三年投奔西方的莫斯科大劇院前導演尤里·盧比諾夫（Yury Lyubimov）。盧比諾夫說，他得到通知，回國將會受到歡迎，並希望蘇聯應先恢復他的公民權（他投奔西方後公民權被剝奪），且不要在他回國後先遭冷落，後被下監。其他一些受到邀請返俄的海外知識分子的共同反應是，除非蘇聯出現大幅度的政治和文化改革，否則他們沒有興趣返國。^⑦

陸、結 論

逃亡行爲包涵相當多複雜的因素：意識形態和政治，宗教和道德，倫理和唯美，國家和個人，高貴和卑微，自私和自利，野心和虛榮，好奇和冒險。總之，每名逃亡者有他（或她）自己的苦衷和原因。但就大多數逃亡者而言，其原因是屬於意識形態和政治的，且牽涉到良知問題。所以，如果被囚禁的異議分子是「良知的囚犯」，那麼逃亡者應是「良知的逃避者」。

此外，就逃亡人員的回歸來看，不禁令人覺得人們往往主觀地認爲某種主義、制度是最適合人類生存的模式，反倒忽略了一人「到底需要怎樣的生活環境。儘管從這些逃亡者身上，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人的軟弱和現實，然我們亦可以了解當他們決定逃離蘇聯時，追求自由乃是他們共同的心聲，而這是人類不可抹殺的性質。」（本文作者現爲本中心約聘助理研究員）

註④ 明報，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三日。

註⑤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一月八日。

註⑥ 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二日，第三十三頁。

註⑦ 參閱註④和註⑤。